

从封闭到开放——对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互动的思考

钟秉枢 (首都体育学院)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把它写入党章。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日益凸显其时代价值,显示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是世界各地都能看懂的“肢体语言”,有着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竞赛规则和运作程序,较少受到国家大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外交中更容易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架起了不同政治外交之间的桥梁,促进合作、增加理解,通过融入公共观点和非国家行为,在及时强化公共观点、社会价值和认同建构以及促进交往和对话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公共外交机会,对我国公共外交、人文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体育担当起代表新中国走出国门,树立国家形象,扩大国家影响,服务国家外交的重要使命,通过与世界体育的互动,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

1963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新兴力量运动会,标志着新兴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1971年,“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两国间的坚冰被打破,开启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开创了处理中国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国两制”构想首先在国际竞技场上得到实现。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使得长期互不承认、互不来往的中韩关系出现松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奥运金牌0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成为重现国威、重塑国际形象的助推器。1990年,北京亚运会让中国突破了国际封锁,改善了外交环境。2007年,温家宝与日本首相的一场棒球切磋完成了中日关系的“融冰之旅”。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与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密集展开的系列主场外交活动,标志着中国开始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迈入展示开放、文明、友好、和谐发展的新阶段,封闭的中国成为开放的中国。

2010年以来,“人文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

导,体育对外交往也更多回归体育运动本质,通过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用体育运动自身的魅力与人文精神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中德、中南等8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均有体育交流的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体育交流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金砖国家运动会进一步深化了五国体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元首体育外交开拓了中国外交实践新创举,展现了我国大国领导人的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从体育对外交往到国家人文交流,从人文奥运到人文外交,从体育明星到国家文化使者,从承办大型国际赛事到彰显大国国际责任,从刷新竞技体育成绩到展示国家综合实力,从扩大体育人员交往到提升体育国际话语权,从实施国际体育援助与赞助到提升中国道义感召力,从推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体育交往到促进国家认同,从投身国际体育学术活动到促进体育科教交流合作,中国体育对外交往诸多方面的实践探索不仅改变着西方对中国封闭、刻板的印象,不断提升中国体育的开放度、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努力塑造着与强国地位相符的国家体育形象,更用体育的独特魅力吸引各国人民,助推文明进程,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中国体育通过与世界体育的互动,向国际社会传递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以及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使命。融入这一使命,需要中国体育对外交往积极转变角色,回归体育运动本质,主动作为。

在新时代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中,必须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助推体育强国建设,有效整合和利用体育资源。在价值认识上,从体育外事到体育外交;在战略谋划上,从部门战略到国家战略;在交流主体上,从单一平面到立体格局;在话语争夺上,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塑造。对内,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以体育塑造公民的文化修养、合作精神、拼搏精神、控

制能力、社会准则,通过把各阶层的人联系在一起而起到社会整合作用,培育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更加遵守国际规则的新型文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外,构建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互动机制和多元工作模式,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体育人文交流,营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中国体育与世界

体育互动关系,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体育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维护中国体育利益,维护世界体育公平正义,共商共建共享,拥抱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人类新型文明观,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交往理性贡献中国体育的智慧。

文章编号:1000-677X(2018)07-0020-02

DOI:10.16469/j.css.201807012

从“一法三纲”到全面推进——对中国体育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于善旭 (天津体育学院)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全方位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在执政方式和治理模式上,由人治走向法治,成为中国深化改革、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伴随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不懈的奋斗中坚定前行。

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体育发展,必然嵌入伟大变革的时代精髓。40年来,法治元素的不断注入,法治轨道的逐步铺设,为中国体育构筑起现代治理的新格局,开创了依法治体的新纪元。在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下,中国体育法治建设日趋加强,不断开辟全面推进依法治体、建设中国特色体育法治体系的新征程。

1 一法三纲:国家推进体育法治建设的标志和开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对改革开放作出决策部署中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使法治自改革之始就成为其应有之义,也为体育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就有着体育立法的内容。为贯彻1982年宪法的体育规定,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体育发展,原国家体委也逐步着手体育法治的有关工作,并于1988年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经过多年的研讨论证,199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体育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我国没有专门体育法律可依的历史,为发展体育事业和加强体育法治建设确立了国家法律依据。在起草《体育法》的带动下,为适应各方面体育工作协调发展的法治需要,国家体委也同时展开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多方面规范文件的起草工作。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与此同时,原国家体委也先后出台了《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一法三纲”的同时面世,形成

了体育立法的一个高潮,成为国家推进体育法治加强建设的重要标志和体育法规制度全方位发展促进的重要开端。

2 奥运法治:开拓国际视野,促进体育法治的全球化发展

以“一法三纲”为标志的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全方位展开后,迎来了北京奥运申办成功的筹办过程。现代奥运的法治品格,决定了法治奥运必定成为北京奥运的运行模式,并通过北京奥运的申办筹办,为国人进一步拓展现代法治的国际视野,对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形成积极的促进。国家积极践行举办奥运的法治承诺,以此为促进法治发展的重要契机,筹办中认真履行《主办城市合同》和严格依法依规组织运行,采取多种方式营造浓郁的法治奥运社会氛围,在加强奥运以及相关立法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2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同时,国务院相继制定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体育文化设施条例》和《反兴奋剂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成为制定体育行政法规最为集中的时期,同时,还出台了加强残疾人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法规性文件和启动了全民健身立法。这些奥运体育立法的颁行,以及各项奥运法律事务的有效处理,形成了法治奥运的整体局面,为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促成了我国新闻管理制度的历史性进步,更对我国体育法治的全球化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3 体育强国:构筑体育重心调整与维权的体育法治保障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党中央立即发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我国体育在新的起点上进入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阶段。建设体育强国,要全面增强我国体育的综合实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使之达到体育现代化的更高水平。作为内在制度模式和外在制度保障的现代法治,在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中愈益凸显其